

余端礼廉洁文化溯源

◎叶蒹 劳开元

余端礼(1135-1201),今溪口镇冷水村人,高宗绍兴二十七年(1157)进士。历知湖州乌程县,孝宗召为监察御史,迁大理少卿、太常少卿,进吏部侍郎,出知太平州,奉祠。光宗绍熙四年(1193),召拜吏部尚书,擢同知枢密院事(《宋史》卷二一三《宰辅表》四)。与赵汝愚共赞宁宗即位,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庆元元年(1195),拜右丞相,二年,迁左丞相,寻出判隆兴府,改判潭州,移庆元,复为潭帅。嘉泰元年卒,年六十七,追赠为太傅、郇国公,谥号为“忠肃”。(见《诚斋集》卷一二四《左丞相余公墓志铭》,《宋史》卷三九八)。

从政期间,余端礼积极践行儒家思想,始终以社稷百姓为重,不惜得罪权贵,敢于直谏,为民请命,屡次不惜犯上请求朝廷为饥荒百姓赈贷放粮、减免税费,被誉为“南渡名宰”。作为南宋历史上著名的廉吏,余端礼深受百姓爱戴和朝野人士敬重,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,有“庐陵四忠”之一称誉的周必大为余端礼所作的《丞相余处恭挽词》中写道:“勋业良平亚,声名丙魏齐。”把他和历史上的名臣张良、陈平、丙吉、魏相并论。著名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其所撰的《宋故少保左丞相观文殿大学士赠少师郇国余公墓志铭》评价其“肃如清风,闻者兴起。勋劳智名,帛素竹清。”并在其所作的《余处恭少师左相郇公挽辞三首》中写道:“忠清两杨绀,诚一再温公。”用“忠清”二字描述出余端礼的忠诚廉正。余端礼一生正直,清廉守正,其清廉作风为中国古代传统廉洁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一、社稷为重的大局意识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,做到正确认识大局、自觉服从大局、坚决维护大局。从政期间,余端礼始终秉持着“社稷为重”的高尚情怀。公元1194年,太上皇孝宗病逝,宋光宗赵惇生来身体病弱,此时又病重,于是称病不主持宋孝宗的葬礼,导致朝廷局势不安、人心惶惶,太皇太后垂帘听政。余端礼与宰相赵汝愚拥立皇子嘉王赵扩继位,赵扩却以“父未亡”的理由拒绝登基。余端礼便上奏说:“不思国家之大计,是守匹夫之小节,而昧天子之大孝”,他认为如今先皇丧事无人主持,百姓人心不安,不应坚持退让,要考虑国家大计,而不是只在乎个人小节,竭力劝谏,最终赵扩继位,号宁宗,人心开始安定,余端礼也被升为参知政事,委以重任。

被征召回答皇帝问题时,宋孝宗

希望恢复中原疆土。余端礼对他说:“谋敌决胜之道,有声有实。敌弱时,先声后实,以警其气;敌强者,先实后声,以俟其机。”(《谋敌决胜的方法在于根据不同情况转换虚实的声势,根据敌人的强弱来决定虚实的顺序,等待合适的时机。)端礼言:“越谋吴,外讲盟好,内修武备……今日之事与越相若。愿阴设其备,而密为之谋,观变察时,则机可投矣。机之未至,不可以先;机之已至,不可以后。以此备边,安若泰山;以此应敌,动如破竹。”上喜曰:“卿可谓通事体矣。”(并以汉武帝反击匈奴、春秋时期吴越之争为喻,告诫孝宗应对外讲求订立盟约示好,在内做好武力征伐的准备,秘密谋划,做好准备,观察时变,伺机恢复。时机没有到来,不能够先举事;时机已经到了,不可以贻误时机。以此来防备边疆,安若泰山;以此来应对敌人,势如破竹。皇上高兴地说:“爱卿可谓是通晓事理啊。”)余端礼升迁为大理少卿。光宗皇帝登基,授予余端礼吏部尚书的官职。

蜀州将帅吴挺去世,“吴氏世握蜀兵,今若复令承袭,将为后患。”汝愚是其言,合辞以奏,光宗意未决,端礼言:“汝愚所请为蜀计,为东南计。夫置大将而非其人,是无蜀也;无蜀,是无东南也。今军中请帅而迟迟不报,人将生心。”不听。后挺子曦卒以蜀叛,如端礼言。(余端礼对枢密使赵汝愚说:“吴氏世世代代掌管蜀地兵权,现在如果又让他的儿子承袭帅位,将成为国家后患。”赵汝愚认为他的话正确,把他的话全部上奏。光宗皇帝心意未决,余端礼说:“赵汝愚的请求是为蜀地考虑,为东南地区考虑。如果委派的将帅不合适,就会失去蜀地;失去蜀地,就会失去东南地区。如今军中请求委派将帅而迟迟不回复,人们将生有异心。”光宗皇帝没有听从。后来吴挺的儿子吴曦最终占据蜀地叛乱,正如余端礼所言。)

由此,我们可以看出,余端礼为官时能始终以社稷为重,不畏皇权,据理力谏,时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。

二、刚正不阿的作风修为

在余端礼到任乌呈县知县之前,县衙受封建贵族控制,只为权贵办事,不为百姓考虑。余端礼到任后,处事刚正不阿,雷厉风行,不理上级官员求情,直接将违法富商按法处置,获得百姓一致好评。余端礼以廉闻名,他在奉旨巡查两浙西路期间,不顾“违令”,放粮赈灾,智惩贪官,匡正朝纲的故事流传至今。婺剧《南宋廉相余端礼》便是以粮仓案为基础,塑造了不畏权贵、清正廉洁、反腐惩贪、刚正不阿的古代清

官形象。

宋宁宗赵扩即位之后,有“翼戴之功”的名相之孙韩侂胄拥功自大,在朝堂中倾轧宰相赵汝愚,使其客死他乡,还将大批对他有意见的人排斥出庙堂,权重一时,专权误国。余端礼不畏权贵,极力反对韩侂胄迫害朝臣。“及韩侂胄以传道之劳,寢窃威柄,汝愚等欲疏斥之,谋泄而汝愚逐。端礼不能遏,但长吁而已。浙西常平黄灏以放民租窳,知婺州黄度以庇蜀吏褫职罢郡,二人皆侂胄所憾,端礼执奏,竟不免于罪。太府丞吕祖俭坐上书忤侂胄南迁,端礼解救不获。他日见上,言:除从官中书不知,朝纲已紊,祸根已滋。”(等到韩侂胄窃取朝政,赵汝愚想上书皇上斥退他,谋划泄露而赵汝愚被迫离开。余端礼不能阻止这件事,只能长长叹气罢了。掌管浙西常平仓的黄灏因为放宽对百姓征收租税而被流放,婺州知州黄度因为庇护蜀地官吏而被革除官职,这两人都是韩侂胄怨恨的人。余端礼坚持上奏,但最终没有免去两人的处罚。太府丞吕祖俭因为忤逆韩侂胄而被贬官到南方任职,余端礼解救他没有成功,舆论于是开始责备余端礼。有一天朝见皇上,说朝纲已被扰乱,祸根已经滋生。)余端礼担任丞相期间,一直保护良善之辈,然而在被韩侂胄锁牵制的情况下,他却有心无力,抑郁不得志。他这种不畏权贵、秉持正义的廉洁操守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三、为民请命的担当情怀

余端礼深谙“食禄者不与民争利”的儒学治国智慧,南宋绍兴二十七年,余端礼考中进士赴乌呈县(今湖州)知县。在担任乌呈县令期间,“民间赋丁绢钱率三岷出一缗,不输绢而折其固,一缗千钱,后增至五千,民不胜病。”(老百姓苦于丁绢钱,即人口税。规定每三丁交纳绢一匹,不纳绢而折价的话,每匹折钱高达一千,后来又增加到折钱五千,百姓受到层层盘剥,生活难以为继,不堪重负。)余端礼立即将此事报到州府,又亲自赶到中书省,这个情况得以逐级上报,最终丞相虞允文及时奏请孝宗,使乌程县每年蠲免钱六万,有效地减轻百姓负担,休养生息,促进当地经济发展。

在宋宁宗庆元元年,安徽、浙江发生饥荒,余端礼奏请宁宗皇帝,得准贷钱发粮救活饥民。余端礼曾在《劝农石头城赋诗》中写道:“苍颜老守政无奇,只要我民不苦饥。奉诏偕行两赤令,职在劝耕无扰之。”(县令白发苍苍,政绩平平无奇,最大的希望就是百姓不会饥饿贫苦,接受皇帝命令来此的两

名县令,职责就是鼓励农民努力耕作,不去扰民。)诗文最后一句了“同见三登太平日,老守不愿万户封”道出了只要天下百姓五谷丰登不再受饥荒之苦,宁可舍弃个人封官进爵的赤子情怀。余端礼关心百姓疾苦,心系百姓冷暖的士大夫品格在他的诗作中可见一斑。

在韩侂胄的唆使下,皇帝任命余端礼为潭州和庆元通判,当时潭州即现在的湖南湘潭,当地民风强悍,局势不安,年事已高的余端礼到那里主事,困难重重,社会动荡,他依然为百姓各项民生事务操劳,最终积劳成疾,不幸病逝于潭州。无论身处何地,无论是升是贬,他以民为本的担当情怀始终未曾改变。因此,余端礼深受百姓尊崇爱戴。

四、廉洁自律的家风家训

余端礼墓位于溪口镇石角村,为浙江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,该墓坐西朝东,现存墓葬占地约48平方米,墓室为砖砌的双室墓,墓顶为花岗石板压顶。1997年冬,文物部门对位于石角村的余端礼墓进行发掘,其陵墓没有宏大的规模,只有一个圆形的土包,四周砖铺地面,未见其它建筑物,墓中没有任何值钱的物件,双墓室(仅宽1米、长2米)只发现一方红砂石墓志,记叙了其生平,以及少数石刻雕花建筑构件。在其出生地冷水村,也未留下荣归故里的奢华建筑。耻于钱财、甘于清贫的余端礼这一生不喜欢钱,吃素食,穿布衣,所挣银两均用于义举之上,修建义亭、开办义学等。耻于钱财留后人,宁愿廉洁传后人。余端礼的《家训六条》中就有:“生之先后则有尊卑长幼之节”“宜孝宜悌”,教育子女要孝顺父母,敬爱兄长;用“反责子弟之不学咎,师之不勤奚可哉,吾族钱谷积聚不亚爱邦而以教读”的案例来告诫子女要爱国爱民。在余端礼廉洁的家风家训教育之下,其儿子余嵘成为了“孤直行志,始终持节”的官员,从侧面也论证了余端礼的廉政修为。

后人为了纪念余端礼,在他的出生地冷水村修建了一座处恭亭。如今,龙游县城越来越多以其名字命名的地名或学校,端礼小区、端礼路、端礼小学等等,“南渡名宰”一生为民的高尚情怀、廉洁自律的家风家训世代为人传颂。

作者分别为县委党校、县纪委监委干部。

